

蘇俄海軍之政治運用

譚 溯 澄

近年以來，研究蘇俄海軍的書籍頗多^①。但純粹研究蘇俄海軍的政治性之運用者，則無一專書出現。有的，僅是些零星的文章而已，如最重要的一篇，是布萊得福·迪斯穆克（Bradford Dismukes）所寫的「一九六七年至七五年蘇俄為政治目的而做的海權運用」（Soviet Employment of Naval Power for Political Purposes, 1967-75）^②。筆者認為，就目前我國所處的戰略環境而言，研究蘇俄海軍之政治運用，是極為重要的一件事。茲就平日研究所得，分蘇俄海軍的政治運用為五大類，而一一說明之。當然，有時一樁蘇俄海軍之政治運用實例，可能包括一種以上的涵義；遇此情形，則以最顯著之政治用意而為之歸類。此乃為研究之方便而已。

一 「嚇阻性」的海軍政治運用

就蘇俄國家戰略而言，「嚇阻性」的海軍政治運用是相當高的一個「行動層次」。所謂「嚇阻」（deterrence），在此可界定為「利用海軍之行動，威脅被嚇阻者，使其切實知悉，若被嚇阻者膽敢為某一行為，則必將遭受報復或懲罰，因而迫使被嚇阻者祇能局限於某種行動範圍之狀態」^③。因之，欲使「嚇阻性」的海軍政治運用成功，端在蘇俄部署艦隊實力時，明確使被嚇阻

註① 如 Norman Polmar, *Soviet Naval Power: Challenge for the 1970s* (New York: Crane, Russak, 1974); John E. Moore, *The Soviet Navy Today*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6); Paul J. Murphy (ed.), *Naval Power in Soviet Policy*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註② 該文收入 Michael McCgwire and John McDonnell (ed.), *Soviet Naval Influence: Domestic and Foreign Dimensions* (New York: Praeger, 1977), pp. 483-509.

註③ 此一定義，係借用哈卡比（Y. Harkabi）對核子嚇阻的界說，加以修飾而成。見林明仁、鄭敦仁合譯（哈卡比原著），核子戰爭與核子和平（臺北：幼獅書店，民國六十一年出版），十四頁。

者感到若採取反擊的行動，則必將是「失多而得少」。依照蘇俄海軍總司令高希可夫(S. G. Gorshkov)的看法，「海軍兵力的特點，就是其高度的運動性，以及在出敵意表的情形下，秘密集中並形成強大編組的能力。同時，海軍兵力對核子武器的效應，要比陸上兵力為穩定」^④，從而蘇俄海軍在嚇阻戰略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決不次於空軍和陸軍。

自一九七〇年以來，蘇俄在歐亞曾經使用海軍力量，於他國所發生的「有限戰爭」中，達成克里姆林宮所希望的「嚇阻性目的」，蓋已屢見不鮮。最明顯的一個例證，就是一九七一年的第三次印巴戰爭。當甘地夫人的軍隊正在急速地向巴基斯坦猛攻時，美國爲了怕東、西巴基斯坦被「肢解」，便於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命令「企業號」(Enterprise)航空母艦穿過馬六甲海峽，駛向孟加拉灣水域，以示聲援。這時，蘇俄亦相續於十二月十八日以及二十四日，前後兩度調遣「反航艦特種部隊」(anti-carrier special task group)，開入孟加拉灣，與美艦相峙。蘇俄的「嚇阻性艦隊」的實力，包括一艘基達級(Kynda-class)的巡洋艦、一艘克里斯塔級(Kresta-class)的巡洋艦、兩艘裝有海對空的飛彈之驅逐艦(係爲保護巡洋艦之用)，另外還有多艘的潛水艦(其中至少有二艘是携帶有導向飛彈者)^⑤。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美國的超級航空母艦「企業號」之排水量爲七萬五千餘噸(滿載時達八萬九千六百噸)，而蘇俄的基達級巡洋艦不過八千二百噸(滿載時爲一萬噸)、克里斯塔級巡洋艦不過六千噸(滿載爲七千五百噸)，但是果真海戰爆發，美國固然可以擊沉蘇俄的巡洋艦，但蘇俄的「反航艦特種部隊」照樣也可以把「企業」號毀滅。無論如何，美國的航空母艦是逃不出俄國巡洋艦所裝備的SS—N—14型的攻艦飛彈，以及水下赤色潛艦之雙重進攻的^⑥。美國海軍在克里姆林宮的「嚇阻海軍政治運用」下，祇有眼巴巴地看到東巴基斯坦被印度所摧毀，而毫無辦法援助。

在歐洲的地中海方面，我們也可以舉一個例子。那就是在一九七三年的第四次以阿戰爭。當「十月戰爭」爆發後的兩星期，蘇俄在地中海的艦隊已比平時增加了十艘艦艇，使得作戰艦艇總數達到三十艘。它們分佈於東、西往來的主要航道，如直布羅陀、西西里島附近的海峽，以及愛琴海一帶，其目的顯然是壓迫美國在地中海的第六艦隊，不能夠干預中東的戰爭。赤色海軍的兵力，於十一月一日達到最高點，計有作戰艦艇至少四十艘。在這種情形下，誠如勞倫斯·惠頓(Lawrence Whetton)在「以阿紛爭：大國的行爲」一書中所云：「當一九七〇年九月的約旦危機時，第六艦隊和蘇俄的海軍部隊均曾進入塞浦路斯島之東南水域。但在一九七三年的危機最高潮時，美國所有的三艘航艦，均以非疏開之隊形，控置於更西方的克里特島附近；這表示了美國

註④ S. G. Gorshkov, "Navies in War and in Peace," U. 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 100, No. 1, January 1974, p. 19.

註⑤ 詳見譯者 James M. McConnell and Anne M. Kelly, "Superpower Naval Diplomacy in the Indo-Pakistani Crisis," in Michael McGeorge (ed.), *Soviet Naval Developments: Capability and Context* (New York: Praeger, 1973), pp. 442-455.

註⑥ SS—N—14型飛彈的射程約爲三十哩。見 "USSR Missiles," *Aviation Week & Space Technology*, March 13, 1978, p. 99.

在後一狀況中的干預可能性，已經降低^⑥。」由此可見，蘇俄在地中海大量增加海軍力量的結果，使得美國的航空母艦已不敢進駐於塞浦路斯臨近的海域，這不能不說是克里姆林宮運用海軍部隊，以達成「嚇阻戰略」之一大成功。吾人可以預料，隨着赤色海軍勢力的壯大，蘇俄利用海軍之「政治驅逼力」以處理「國際危機」的或然率，必然會在未來大幅增高。

二 「運補性」的海軍政治運用

所謂「運補性」的海軍政治運用，是指在他國發生戰爭或於平時急需期間，蘇俄動用其運輸艦或登陸艇，裝載適量的物資或人員，以支援他國，從而擴張蘇俄在相互關係上的影響力。這種對於海軍的運用，如和前述之「嚇阻性」相比，不同之點有三：第一是，在一般情形下，「運補性」海軍之政治運用，其規模較小，無需涉及飛彈巡洋艦等之大型作戰艦；第二是，「嚇阻性」海軍之政治運用必與戰爭有關，但「運補性」海軍之政治運作雖可能與戰爭有關，但却不必然與戰爭有關；第三是，欲實施「嚇阻性」的海軍運用，則一定要有堅定的對抗決心，它的衝突昇高的可能性相當地大，反觀「運補性」之海軍運用，它的衝突昇高可能，在通常的情形下，是相當地小。

茲舉戰時和平時各一例，以明蘇俄實施「運補性」海軍政治運用之實況。先言戰時的例子。一九七三年二月間，非洲北部的摩洛哥（Morocco）國王海珊（King Hassan）決定以其國內的陸軍對敘利亞加以援助，目的在增強敘國駐紮於哥蘭高地（Golan Heights）的軍事力量。可是摩洛哥本身海軍勢力薄弱，而由摩國港口至敘利亞最少要走二千餘海里的航行，以色列的潛艇和飛機大有可能將海珊國王的軍隊埋藏於海底^⑦。蘇聯即於此時出面，願意將摩洛哥的軍隊用軍艦載到敘利亞。同年四月十三日，有兩艘俄國的「鱷魚級」（Alligator-class）登陸艦抵達北非的阿蘭港（Oran）。這顯示海珊國王的軍隊是先由本國進入阿爾及利亞，然後再由阿爾及利亞的阿蘭港上船的。這樣，雖然蘇俄登陸艦所載的完全是摩洛哥的軍隊，但還不致於太顯著，因為摩國的軍隊是在阿爾及利亞開跋的。八天以後，這批軍隊在敘利亞的塔圖士港（Tartus）上岸^⑧。由於「鱷魚級」登陸艦之排水量每艘僅為四千一百噸（滿載為五千八百噸），所以一次航行未能把摩國的人員和裝備一齊載完。據悉，在同年七月間，又

註⑥ 謝永愷譯，以阿紛爭：大國的行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七年初版），六十五頁。

註⑦ 以色列的潛艇爲從前英國所造，排水量在一千三百噸左右，共二艘，均裝有二十一吋之魚雷發射管六門，潛水時速爲十五至十八海里。分別命名爲「巨靈號」（Leviathan）和「海豚號」（Dolphin）。

註⑧ Bradford Dismukes, "Soviet Employment of Naval Power for Political Purposes, 1967-75," in M. McCgwire and J. McDonnell, *op. cit.*, p. 492.

有蘇俄派艦艇運送摩國軍隊之事發生^⑩。至該年「十月戰爭」爆發時，已有二千二百名之摩洛哥陸軍和三十輛左右的坦克進駐於敘利亞國內。可以想見，這次的「運補性」海軍運用是相當成功的。

在平時以海軍完成「政治性運補」的例子，可以拿目前越南與蘇聯的關係作為例證。自從一九六九年三月以後，就有蘇俄的軍艦斷斷續續地進出越南港灣，其中也包括登陸艦。這些登陸艦當然不會空着船跑進越南的港口之內的，它們所攜帶的物資，主要是精密的武器、貴重的建材以及成套的機器，致使目前蘇俄對越南的援助平均值每天總在二、三百萬美元^⑪。除了登陸艇而外，蘇俄海軍尚有若干運輸艦，如一萬噸以上的「堪察加級」(Kanchatka-class)的、一萬兩千四十噸之「貝加爾級」(Baikal-class)的、以及五千零五十噸的「秋林級」(Chulym-class)的，其中也有到過海防、胡志明市或金蘭灣的^⑫。總之，蘇俄不但動員其商船，而且還利用其海軍，以達到它的對外「政治性運補」的目的。

以上所舉，都是比較顯著的例子。另外，據安妮·凱利(Anne M. Kelly)之研究，謂在一九七三年中，蘇俄還曾幫助過南葉門運送軍隊至鄰國阿曼(Oman)，目的在使阿曼國內的多發叛變(Dhofar rebellion)之聲勢更為壯大^⑬。這種意圖從一方面看，是和前述的運送摩洛哥兵力至敘利亞相仿，即克里姆林宮乘火打劫，惟恐中東不亂；但從另一方面看，却又有很大的不同，即北非的摩洛哥和地中海東岸的敘利亞都是合法的獨立國家，但多發之叛變却是非法的。蘇俄以軍艦載運南葉門的軍隊去支持多發的叛亂，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侵略」行為！

三 「示威性」的海軍政治運用

一國的海軍，代表了該國國力的一部份。所謂「示威性」的海軍政治運用，簡單地說，就是「顯示國力，威脅對方」，它多多少少帶有「壓迫」的味道。長久以來，蘇俄領導階層已經知道使用其海軍艦隊奔馳於海上，以期獲得亞歐大陸的邊緣國家以及更遠處的其他國家之尊重和順從。由於美俄雙方核子武力的「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之形成，超級強國之間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已相對地降低。在這種情勢下，海軍艦隊之用於「顯示國力」方面之趨勢，在可預見的將來，將會有繼續的增加

註⑩ Ibid.

註⑪ 「蘇俄與越南利結金蘭？」中國時報，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註⑫ 關於蘇聯海軍的運輸艦性能，參見 John Moore (ed.), *Jarvis Fighting Ships, 1976-77* (London: Jane's, 1976), p. 748

註⑬ Anne M. Kelly "Port Visits and the Internationalist Mission of the Soviet Navy," in M. McGwire and J. McDonnell (ed.), *op. cit.*, pp. 511-529.

。此種「海上揚威」的國際政治涵義，吾人不應予以低估。事實上，由於蘇俄在日本海以及遠東各海域的大規模軍事演習，最低限度已使日本人在心理上就有對蘇俄「招架不住」之感^⑭。

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前，蘇俄海軍的演習大部份都是在其國土附近的水域裏實施。從一九六八年起，蘇俄海軍的演習即伸展到較遠的水域。迨一九七〇年，便擴大成爲全球性的海洋大演習。當年四、五月間，克里姆林宮下令出動數百艘軍艦，遍佈於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一帶，舉行戰略性的艦羣假想敵對抗^⑮。五年之後，蘇俄海軍又實施了第二次的全球大演習，僅在西北太平洋一帶，就有四個任務艦隊出現：一個在日本海，一個在鄂霍次克海，第三個在日本島以東之四百八十英里處，第四個則在加洛林羣島 (Caroline Islands) 與菲律賓羣島之間。蘇聯有計劃地不斷擴大其五年一度的全球海軍大演習，這顯然是一種「示威性」的海軍之政治上的運用。它不但打擊了美國在世界上的「海權聲望」，也使得那些原本與美國結有深厚關係的盟國感到憂慮重重。這種心情，在遠東方面，可以引證一日人的研究爲證。前日本海軍中將筑土龍男即云：

「西太平洋的蘇俄海軍實力，雖有以強力從事局部攻略的能力，但是因爲支援基地受自然條件的障礙極大；除潛水艇外，實施大規模外洋攻略的能力顯仍不足。然在平日耀武揚威，擴張其影響力，使對象國心生畏懼的目的，仍然可以有效達到^⑯。」

此意即是說，蘇俄的遠東海軍無法達成遠洋攻略（如攻佔夏威夷）之目的，但是却可以對亞洲的鄰近國家，有效達到「示威性」之海軍的政治運用的目的。平實地說，日本人之怕蘇俄海軍，是遠比中華民國爲大的。尤其是當蘇俄運用海權壓力，硬在原屬於日本領土的國後、擇捉兩島駐紮重兵後，日本更不得不注意此問題。筆者認爲，當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蘇聯五萬噸的攻擊航空母艦完成後^⑰，將益使克里姆林宮在運用「示威性」的海軍以圖擴大政治影響力的計謀上，容易得到功效。

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初，蘇聯也曾以太平洋艦隊爲政治的工具，向中共大事耀炫武力。當時以六千噸的「克里斯塔級」巡洋艦一艘爲主，伴隨着三千七百五十噸的「卡新級」(Kashin-class) 和噸位相彷彿的「加寧級」(Kanin-class) 驅逐艦各一艘，另外帶有一隻八千兩百噸的運油艦，合組成了特遣部隊，由海參崴南下，經過日本海和對馬海峽，繞過福江島而駛向鄰近大陸的黃海、東海水域，這是很不平常的事^⑱。同年五月十一日，中共在「人民日報」大加抨擊云：「對馬海峽是由日本進出東海和太

註⑭ Ian Mackenzie, "Soviet Naval Buildup in Far East Worries Japan," *The Japan Times*, April 7, 1976, p. 9.

註⑮ Carl C. Jacobsen, "The Soviet Navy: Acquiring Global Capabilities and Perspectives," *Naval College Review*, Vol. XXIV, No. 7, March 1972, p. 48.

註⑯ 筑土龍男，「蘇俄在西北太平洋海權擴張之分析」，於「東北亞地區戰略情勢研究會」所提出的論文，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臺北舉行。

註⑰ 據「航空及太空工藝週刊」載，蘇俄的新型航空母艦已於黑海造船廠建造，可望於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服役。

註⑱ 趙倩，「從俄艦在東海對匪的威脅看雙方關係」，匪情月刊，十九卷，二期，民國六十五年八月，二十九頁。

平洋的咽喉，蘇修從老沙皇起，到新沙皇止的海盜行徑，都是由對馬海峽進入東海海域^⑨。「此種文句，顯示了北平已感覺到克里姆林宮對它「示威」的嚴重性。爲了瞭解實情，中共駐於日本的「新華社」記者，還親自跑到對馬島進行採訪。以上所舉，都是在亞洲的例子；在歐洲，蘇俄的「示威性」海軍運用也曾發生於挪威北方的巴倫支海、英倫西方的中大西洋、以及義大利南方的海運輻湊線上。縱使在美國南方的加勒比海，過去亦有證明，表示蘇俄海軍於該水域舉行了演習。

四 「敦睦性」的海軍政治運用

本文在前面三節中，依序所言的「嚇阻性」、「運補性」與「示威性」的種種政治運用，多少均含有「敵意」之火藥味道，此在現實之國際政治中本不足怪。本節所言的，是不帶「火藥味」的純友誼的政治運用。有人或許會提出下面之問題：卽既是「政治」之運用，又有何「純友誼」可言？況且蘇俄本爲一對外侵略的國家，又如何可有「敦睦性」的海軍行動？對於此一問題，筆者擬作如下之答覆。吾人應知，在國際關係中的行爲，無論一國是多麼的險惡，它總不可能連一絲一毫的「純友誼」都不存在；既然有「友誼面」的行爲存在，而且蘇俄在過去又有此種例子可尋，因之，吾人就需有此類別出現。這是一個「事實有否」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希望它不出現」的問題。既然它出現了，我們就要有適當的歸類。否則，就無法周延，就有了缺漏。

茲舉一例言之。一九七四年上半年蘇俄在印度洋最顯著的活動，就是派遣「一萬六千噸的「史瓦德羅夫級」(Sverdlov-class)重巡洋艦率領着驅逐艦，抵達印度西海岸的首要港口孟買(Bombay)，訪問了一週^⑩。由於孟買係印度西部艦隊司令部所在地，故頗引起國際間的重視。試分析蘇俄艦艇訪問性質，它既不是「嚇阻」印度，也不是向印度「運補」東西，更不是向印度「示威」(如果是「示威」，印度政府根本不可能准許該艦訪問)。俄艦訪問的目的，卽合於本節所謂之「純友誼性」之「敦睦邦交」的性質。

當然，無論任何一個國家的軍艦，駛赴外國港口訪問，總免不了要帶些「宣傳」的味道。對於此點，現任蘇俄海軍總司令高希可夫並不否認。他曾明白地說道：「由於蘇俄海軍已崛起於海洋之上，所以我們(俄國)軍艦訪問外國港口的事乃愈趨頻仍，而不斷在克盡其社會主義國家『全權大使』的職責。單就過去三年中(一九六九——一九七二)，差不多有一千艘蘇俄的軍艦和輔助艦艇，訪問過歐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六十個國家的港口。總共有二十萬以上的我們之官兵，曾經於外國登岸活動過^⑪」

註⑨ 引自前揭文(註⑩)。

註⑩ 「蘇艦增駐印度洋」，文匯報，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一版。

註⑪ 錢懷源、黃志潔譯(高希可夫原著)，蘇俄海軍的崛起(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出版)，一六八頁。

。」高氏似乎對蘇俄海軍官兵在外國的表现甚為滿意，所以他肯定地說：「所有這些（海軍）訪問，都是蘇俄人民中最具代表性的代表所作的一種拜會。實在說來，在每一艘戰艦和輔助艦上面，各色各業出身的人物樣樣俱全，他們有工人、集體農場的農夫和工程師、技師等等。他們來自不同的省縣、不同的共和國；他們還屬於不同的民族。……海軍艦艇的官式拜會和事務性的訪問，對於改善國家與國家間、以及民族與民族間的共同關係，以及加強蘇俄之國際影響力，都有很大的貢獻。」

據可靠的統計，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之五年間，祇以非洲國家為例，以阿爾及利亞之港口被訪問的次數最多。其次是埃及、摩洛哥、利比亞、索馬利亞，這四國都是中程的程度；再次則是肯亞、坦桑尼亞、奈及利亞、比紹幾內亞、西非幾內亞以及模里西斯等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蘇俄艦隊至模里西斯的首府路易港（Port Louis）的訪問，它不但包括有巡洋艦和驅逐艦，而且還有潛艇在內²³。

在中東方面，蘇俄和伊拉克的關係很久以來就非常密切。蘇艦訪問，更不足為奇。如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七日，由「遠東共青團號」驅逐艦、潛艇和補給艦組成的一支艦隊，即曾抵達伊國之翁姆科色港（Um-al-Qusar）。最近在遠東方面，有一個案頗值引述，即蘇俄太平洋艦隊副總司令率領三艘軍艦（包括有飛彈艦）赴河內訪問，越南政府曾舉行盛大歡迎，這就是蘇俄利用海軍以達成「敦睦邦交」之政治目的之顯著例子。

五 「探索性」的海軍政治運用

在國際的互動關係裏，每一方於決策之先，都要冷靜地去揣測對方所可能發生的反應。但是有時基於一種特別的考慮，或在一種特別的情況下，不易確定對方會有何反應；於是，一國就可以利用軍艦作為一種政治工具，去「試探」一下對方的態度，看看對方究竟有何反應，其堅決執行的程度為如何。凡屬此類的行動，就是吾人於本節所要討論的「探索性」的海軍政治運用。依過去蘇俄所有的實例而言，克里姆林宮所要「探索」的問題，大多是一種極為敏感的問題。第一個例子，吾人試舉蘇俄於一九七〇年代相繼派遣「F」級（Foxtrot-class）、「A」級（Echo-class）、「G」級（Golf-class）等各種潛艇，進入古巴港口，藉以試探美國之決心為證。

蘇俄最早於一九六九年七月，派遣了兩艘「F」級的潛艇進入古巴港口，由於這種潛艇不是戰略性的潛艇（即不帶有彈道飛彈），所以美國並未提出異議。當蘇俄知道美國可以允許蘇俄的某種潛艇停泊古巴碼頭時，克里姆林宮就在一九七〇年的五月不

註²² 同註²¹，一六八至一六九頁。

註²³ 參見譚潮澄，「蘇俄海權擴張與印度洋之安全」，東亞季刊，八卷，三期，民國六十六年一月，二二四頁。

但把「F」級潛艇開進古巴，而且還帶進了「E」型潛艇。「E」型潛艇雖然是一種以核子動力來航行的潛艇，但是它也沒有裝置彈道飛彈，而僅具有「巡航飛彈」的發射能力，因之，美國還是容忍下來了。到了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一艘「G」型潛艇終於進入古巴。它裝備了具有戰略攻擊力的彈道飛彈，但是却依靠傳統的內燃機來航行，所以它是一種以傳統動力為基礎的戰略潛艇。由於蘇俄的訪問是在秘密中進行，外界不知，所以美國也就沒有深究。至一九七四年四月底，「G」型潛艇又再度開入古巴。這次古巴故意讓大眾知曉，特別將「G」型潛艇的照片顯著刊登在首都哈瓦那(Havana)的英文報紙上^②。它的目的當然是在試探美國人對於一九六二年的「赫魯雪夫·甘迺迪協議」(Kennedy-Khrushchev agreement)之涵義究應作如何限度的解釋。如果嚴加解釋，美國政府可以引用甘迺迪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日的立場，此即「只有當所有的攻擊性武器都完全從古巴撤出，並且在未來也不能再引進於西半球，這樣，加勒比海才能有和平」^③。容我們坦白地說，目前美國並沒有這樣嚴格地解釋，所以像核子潛艇也可進出古巴的港口。這顯然是蘇俄成功地運用了「探索性」的海軍政治而帶來的結果。

在遠東方面，蘇俄的太平洋艦隊所屬的船隻，突於一九七三年五月穿過臺灣海峽，此一舉動在當時頗為國際間所注意。窺其用意，顯然是在「試探」中華民國以及美國對此事的反應。所以我國除聲明臺灣海峽為公海，任何國家均可依照國際法之「公海自由」原則而自由穿越外，還強調不與蘇俄作政治接觸的決心。雖然如此，可是對國人的「後遺」影響還是相當地大。因之，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外交部政務次長錢復還在闢謠，謂外傳蘇俄軍艦曾在馬公港口修理，乃絕對沒有其事。他並呼籲國人說：「從民國七年蘇俄政府成立後，我國即多次與他們接觸和合作，但這些接觸與合作都給我們帶來了慘痛的後果^④。」

在今年秋天，蘇俄的海軍訓練艦曾至南中國海一帶巡航。克里姆林宮就乘機向東南亞國協的五國提出請求，擬以「學生訓練見習」之理由，訪問泰國、印尼和菲律賓。結果這些國家沒有一個肯接受蘇俄的要求。蘇俄的這種舉措，顯然是「試探」東協五國之對於蘇俄海軍的態度。蘇俄這次確是失敗了。但筆者認為，莫斯科將來還會以其他的方法再提出此類的要求。當美俄兩國沒有簽訂「防止海軍艦艇海上衝突互撞協定」之前，有許多的蘇俄軍艦故意在美國軍艦旁邊胡亂航行，也有時以海軍航空隊的飛機直逼美艦之艦橋，諸如此類，都含有「試探」美軍忍受程度以及作何種反應的意味。

註② Barry M. Blechman and Stephanie, E. Levinson, "Soviet Submarine Visits to Cuba," in M. McGwire and J. McDonnell, *op. cit.*, pp. 427-429.

註③ Ibid., Se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1970.

註④ 「蘇俄國字基本立場——絕不與俄進行接觸」，中國時報，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六 結 論

由本文以上的分析，可知蘇俄在運用海軍之政治影響力的實例上，有的是成功了，但也有失敗的。不過綜合看來，它是成功多於失敗，此點是頗值得我們注意的。尤其是在國際的政治危機中，利用飛彈艦艇以「嚇阻」美國的航空母艦，致使美國的龐大軍艦不能發揮預期的作戰力量，是以美國的國際聲望逐漸下降，而形成時下之所謂「大國無用論」之印象。

蘇俄利用海軍作一政治工具，展開對於日本的壓力，不但使日本對於恢復「北方領土」的圖謀感到絕望，而且導致日本人本身之許多不健全心理。故東亞之東緣自由國家中，恐俄程度最利害者可能即為日本。這主要是蘇俄長期運用「示威性」海軍之政治影響的結果。

在蘇俄其他諸種海軍政治力之發揮上，亦有多處值得注意。如克里姆林宮運用「漸進探索」的方式，使得美國竟不干涉赤色潛艇出入古巴海港。這不但加強了莫斯科對於哈瓦那之控制力，而且也讓卡斯楚更覺得驕狂自負，更鼓勵他於世界各地倡亂。展望未來之一九八〇年代，美國的造艦速度殊不樂觀，而蘇俄則大批新艦不斷下水，從而使它在國際間的「海權聲望」也逐步增高。西方究應採取何種對策，目前尚無定型可言。卡特自當政以來，已使美國地位大幅下降，他能否有效對抗未來蘇俄繼續擴大的「海權政治影響力」，似亦在未定之天。